

跨國／時做媽媽：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 母職實作、協商策略和心理矛盾

梁莉芳

001

跨國／
時做
媽媽

謝謝參與本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姐妹，她們無私的分享，讓研究的進行與文章的書寫，得以可能。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20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謝謝評論人藍佩嘉教授以及其他與會者的回饋，修改過程中，受益於期刊匿名審查委員與編委會的具體建議。最後，謝謝研究助理尤慧晴協助部分訪談的進行以及文章校對。

※收稿日期：2023.09.07 接受刊登：2024.07.08

梁莉芳(✉)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9743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2段1號(人社二館D309)

Email：lfliang@gms.ndhu.edu.tw

摘 要

藉由描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活出來的生命經驗(lived experiences)，本研究闡述她們的母職實踐鑲嵌於勞動力接受國的遷移體制，受到客工制度、物質條件以及身體不在場的限制，她們必須協商印尼傳統性別文化所定義的「理想母親」，並賦予海外工作母職照顧的意涵。為因應勞動力跨國遷移所造成的物理空間與時間性的重組，這群印尼女性移工藉由匯款、贈送禮物、安排照顧代理人，以及運用資訊與通信技術(以下簡稱為ICTs)等策略，呈現她們如何動員資源進行跨國／時的照顧實作與協作，並透過ICTs媒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和維繫關係。她們的經驗顯示了結構條件如何形塑和限制她們做為母親的能動性。跨國母職之所以可能，不單是因為金錢匯款、物質、照顧代理人以及ICTs的進展和普及，更關鍵的是女性移工的參與，以及付出的勞力、心力和情感工作。不過，她們往往得在過程中經驗親密關係的不對稱。本研究不將遠距母職詮釋為「犧牲的愛」，而是關照過程中她們所經歷的系列心理矛盾——愛／物質、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並進一步指出，跨國遷移造成空間與時間的重組，以及ICTs為媒介的母職實作，是形塑上述心理矛盾的主因。同時，移工母親的經驗，協助我們反思對立的二分框架難以理解跨國母職的動態與複雜。

關鍵詞：家庭看護移工、母職、跨國家庭、勞動力遷移、印尼

Doing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trans-border and trans-temporally: Indonesian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practices of their mothering,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nd ambivalences

Li-Fang L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Indonesian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in Taiwan to show how mothering practices are embedded within the host country's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regime, with constraints tied to a formal guest worker system,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physical absences. All of these factors require negoti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onesian "ideal mother" cultural construct, resulting in maternal care significances in their overseas work. In response to spatial and temporal reorganization associated with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donesian women utilize strategies such as sending remittances, giving gifts, arranging for care proxies, and the specific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Combined, these strategies repres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for cross-border/temporal care and collaboration, enabling ongoing participation in their children's everyday liv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other relationships. Instead of oversimplifying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as "sacrificial love," this paper discusses complex ambivalences inherent to caregiving: love versus material needs, permanent versus temporary statuses, distance versus intimacy, and actual versus virtual. Spatial and temporal reorganization resulting from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CTs shape these ambivalences. The article refutes binary analytical models for their inadequacy in capturing the dynamic and multifaceted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Keywords: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ambivalences, labor migration, Indonesia

一、前言

家庭幫傭的存在有其獨特的歷史與社會脈絡 (Romero 2016)，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全球城市的興起，增加大城市對於底層勞動力的需求，包括家庭幫傭與看護工 (Sassen 2013)。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 (Sassen 1984; Mohanty 1997; Salzinger 2004) 指出，父權體制與全球資本共謀剝削女性的勞動力，從生產工作擴及再生產勞動，對第三世界的女性造成劇烈的影響。過去 50 年間，第三世界女性成為新的商品，她們的母國將輸出其勞動力視為經濟發展的策略，同時滿足第一世界國家對於低廉勞動人力的需求 (Sassen 2013)。遷移女性化 (Oishi 2005) 的趨勢，反映越來越多的女人參與跨國勞動遷移。過去近 30 年間，「轉移的母職」(diverted mothering) (Horton 2008) 現象逐漸獲得媒體、非政府組織、政府以及學術研究的關切，其描繪因跨國勞動遷移必須將子女留在母國之女性的母職經驗，包括本研究所關心的家庭看護移工。

以下，我以「家庭移工」泛指在個別家戶內工作的家務移工與看護移工。在臺灣的脈絡下，我採用「家庭看護移工」(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 的稱呼，除了用以指出臺灣政府移工政策分類下，幫傭和看護工為不同的類別，政策區分兩者的工作內容以及雇主聘用資格的差異；同時，「家庭看護移工」的稱呼強調她們工作屬性的照顧本質，這類的隱形工作，往往缺乏等值的回報和肯認 (Liang 2018)。既有家庭移工的研究，多從社會結構因素探討她們跨國遷移的勞動經驗，包括移工政策的限制、與雇主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所造成的不當對待和歧視、危脆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等等 (Anderson 2015; Parreñas 2017; Parreñas et al. 2021)；或是從能動性的角度，描繪她們如何協商、抵抗結構性的限制，呈現其韌性 (Lan 2003; Rother 2017;

Rydzik and Anitha 2020)，儘管分析取徑有所差異，相關討論皆聚焦於移工的勞動身分。90年代晚期開始，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遷移對家庭移工的多重影響，不僅限於勞動，更擴及生命經驗的其他面向，包括母職實踐和親密關係。

跨國遷移與海外工作造成空間與時間的重組，挑戰並限制家庭生活的實作、情感的維繫，對親職實踐和親子關係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父權做為支配的意識形態，多數的社會視母親為女人與生俱來的性別角色，即便處於「身體缺席」的情境下，女性移工持續被賦予家庭照顧的期待和義務（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5a, 2005b）。主流論述差異化看待女性移工和男性移工在親職實踐的缺場——男性移工因其養家者的角色，他們的海外工作被認為是負責的表現；女性移工卻常被再現為遺棄小孩的問題母親（Parreñas 2001a; Asis 2002）。然而，既有的研究（Nicholson 2006; Tungohan 2013）發現：受到跨國的客觀條件限制，女性移工仍努力運用各種資源、發展多樣的策略，與留守母國的子女互動、維持情感關係和創造遠距下的親近性，持續她們的母職實作，展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性（maternal agency）。Parreñas（2010: 1827）將跨國母職定義為「因應遷移所形塑的空間與時間的分離，母性編派的重構」。跨國母職現象不僅帶來日常生活中照顧的重新安排，也挑戰傳統母職的定義和常規性（normality）、擴大母職的內涵以及實作策略。

在跨國遷移脈絡下，並不是只有家庭看護移工才會面臨時空限制的遠距母職以及其造成的影響，從事其他職業類別的女性移工，也遭遇相似的課題和處境。不過，Hondagneu-Sotelo 與 Avila（1997: 552-553）的研究指出，不同於正式勞動市場的生產勞動，在私人家戶擔任再生產勞動（包括家務工作或照顧）較容易排擠到工作者本身的日常家庭照顧。本研究選擇家庭看護移工為研究參與對象，除她們的有酬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共容、兼顧

更加不易，也考量相較於其他職業類別的移工，受到臺灣客工制度的影響，她們的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更不受到法律規範的保障（Cheng 1996; Liang 2014），移動能力（mobility）與能動性最為受限。

過去 20 年間，國際遷移現象產生顯著的改變，因多重中介行動者的介入，除遷移模式更為碎片化、非線性化（Triandafyllidou 2022），同時，接受國的遷移政策更為限縮，更偏好暫時性的遷移體制（Chilton and Posner 2018）。回應遷移體制的改變，越來越多研究聚焦於暫時性的遷移（Dauvergne and Marsden 2014; Bélanger and Silvey 2020）對移工／移民和他們的家庭造成的影響，包括他們參與和實踐跨國照顧的能力（Merla and Baldassar 2011; Kilkey and Merla 2014）與母職經驗（Cohen 2000; Pe-Pua 2003; Fresnoza-Flot 2009）。

回顧跨國母職的相關研究，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選擇從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國家間的不平等切入，將女性家庭移工的跨國移動視為非志願性的選擇，關注她們受到勞動力與情感的雙重剝削，以及對其母國家庭造成的負面影響（Parreñas 2003, 2005a; Lutz and Palenga-Möllenberg 2012）。另外的研究則側重女性移工的主體性，呈現她們在結構條件的限制下，如何藉由詮釋自身遷移的意義以及發展多重的管道和策略，協商母職的內涵和實作（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5a, 2005b; Peng and Wong 2013; Vives and Silva 2017），展現做為母親的能動性（McKay 2007; Dewi 2011）。本研究結合上述的分析取徑，強調遷移和母職、結構和能動性並非獨立的分析面向，對於看護移工跨國母職實踐的理解，必須鑲嵌於她們所處的遷移體制、其所造成的空間和時間的重組，以及性別、族群與階級所形塑的特定社會位置。

臺灣的移工體制以客工制度為基礎（曾熾芬 2004），家庭看護移工最長的工作年限為 14 年，期滿後，她們無法再申請任何職業別的工作簽證。¹ 在臺灣工作的期間，根據規定，她們必須與雇主同住，持工作簽證期間不能與臺灣人結婚，同時，家人無法依親在臺灣居住，換言之，沒有家庭團聚的權利。本研究不僅將暫時性的遷移（temporary migration）視為分類臺灣移工體制的法律框架，規範移民居留年限、公民取得的路徑和身分權利，以及相關的福利和服務，更藉由（再）概念化時間性（temporality），進一步形塑移工日常活出來的時間（lived time）（Boersma 2019; Triandafyllidou 2022）。暫時性遷移體制的安排，不僅透過政策的規範限制她們的移動能力、做為母親的能動性，更具體影響她們當下的決定和未來的計畫，包括（再度）海外出國工作、延長遷移年限、延後和家人團聚等。既有的研究多從物理空間的距離面向，討論遷移對家庭動力和親密關係造成的影響（Boersma 2019），本研究則納入時間性的面向，指出遷移是一不僅涉及空間，也涉及時間的過程（Roberts 1995），並藉由時間尺度（timescale）（Meeus 2012）的概念，討論臺灣的客工制度與跨國母職間的動力。

藉由描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活出來的生命經驗（lived experiences），本研究闡述她們如何理解日常的現實、賦予經驗意義，以及過程中的心理矛盾，主要的研究提問為：在跨國遷移脈絡下，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藉由整合物質、情感和網絡資源，所發展的母職實作策略為何？遷移體制如何形塑她們特定時空下做為母親的能動性？她們如何發展、維繫與留守子女間的親密關係？資訊和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1 111 年 4 月 30 日起，勞動部推動「留用外國中階技術人力計畫」（又稱「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家庭看護移工符合一定的薪資數額和技術條件標準，即可透過雇主申請永久居留。參見：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資深移工留才久用方案，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56DB4C84EA0508DE，取用日期：2023 年 2 月 19 日。

technologies，以下簡稱為 ICTs）如何成為重要的媒介？實作過程中她們所經驗的心理矛盾與不對稱的情感關係為何？一方面，藉由描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元的母職實作策略，研究發現呈現她們受限於結構的能動性；另一方面，本研究不將遠距母職詮釋為「犧牲的愛」，而關照過程當中她們所經歷的系列心理矛盾——愛／物質、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我指出，因跨國遷移造成空間與時間的重組以及 ICTs 為媒介的母職實作，是形塑上述心理矛盾的主因，同時，移工媽媽的經驗也協助我們反思上述對立的二分框架難以理解跨國母職的動態與複雜。

二、勞動力遷移脈絡下的跨國母職：印尼到臺灣

遷移女性化是當代勞動力遷移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相較於其他區域，遷移女性化現象在亞洲更為顯著，亞洲不僅是女性勞動力的輸出國，同時也是輸入國（Hugo 2005）。1970 年之後，亞洲女性移工的數量成長快速，她們多半都是暫時性的移工，在區域內跨國移動，此反映接受國限縮的遷移政策，更加偏好暫時性的遷移體制（Chilton and Posner 2018）。研究發現，暫時性的遷移體制和政策欠缺對移工權利的保障，形塑他們危脆的遷移身分（Piper 2010; Tazreiter 2019），並限制其移動能力和能動性（Bélanger and Silvey 2020）。「暫時性的遷移」不僅做為官方的政策類別，同時也是體現移工日常實作的類別（Triandafyllidou 2022）。本節闡述印尼與臺灣分別做為勞動力輸出國與輸入國的脈絡，指出它們在全球經濟重構下的結構性位置，以理解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在特定時空下的遷移與母職經驗，如何受到更大的體制、政策所影響。

（一）印尼的海外移工

印尼是全世界第四大的國家，人口約有兩億六百萬。從荷蘭殖民開始，印尼便有遷移的傳統，來自爪哇 Java、Madura、Ambon 和 South Sulawesi 等地區的人會向外尋找教育、工作機會 (Spaan 1999)。直至今日，他們不僅保留遷移的習慣，範圍更從境內移動擴大到海外遷移，其中，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扮演重要的推手。為了增進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的整合，國際金融機構採取結構調節方案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透過擴大私有化與限縮公共預算等措施，介入這些國家的公共政策與經濟發展 (Moghadam 2005)。其中，印尼也是受到結構調整方案劇烈影響的國家之一，後果包括失業率的上升以及勞動力的海外遷移。

在過去的 30 年間，印尼成為最大的勞動力輸出國之一，估計約有 274 萬有證海外移工，² 多數在中東地區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包括馬來西亞、臺灣、香港、新加坡、南韓以及日本，擔任低技術或類技術性的工作 (Hugo 2002)。在亞洲國家的印尼移工以女性為多數，大多從事照顧與家務勞動相關的工作。

與其他勞動力輸出國相較，印尼較晚才出現移工海外遷移的現象，蘇哈托執政時期 (1966-1998)，開始將輸出勞動力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在第一個五年計畫階段，海外移工僅約 5,624 人 (Hugo 1995)。第三個五年計畫階段 (1979-1984) 開始，印尼政府設定海外移工的目標人數，這個階段是 10 萬人，實際的人數為 96,410 人。從那之後，每階段的海外移工人數都超出印尼政府的預設目標。印尼政府將輸出勞動力視為是緩解國

2 參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2024，<https://indonesia.iom.int/sites/g/files/tmzbd1491/files/documents/2024-07/iom-indonesia-2023-year-in-review.pdf>，取用日期：2024 年 10 月 25 日。

內失業率以及增加外匯的策略（Palmer 2016），政府積極促進海外移工的態度，同時反映於勞動力輸出的建制化過程。

1980 年代早期，印尼政府開始設置專責勞動力輸出的部門（例如：人力與跨國遷移部門、海外聘僱中心），不只是扮演管理與規範的角色，同時促進移工海外遷移，特別是女性移工（Hugo 1995: 282）。從那時候開始，印尼海外移工人數年年上升。印尼勞動部清楚指出政府的勞動力輸出政策：「勞動力輸出方案是國家勞動力計畫的一部分」（Hugo 1995: 275），勞動力輸出成為重要的國家政策。

在蘇哈托新政府時期，特定的性別意識影響國家的發展政策，印尼政府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女性和男性的勞動力。國家倡議與家庭、家戶領域連結的理想女性特質，不過，國家操作性別意識形態的方式具備高度的階級差異，舉例而言：當印尼政府馴化（domestication）中產與中上階級的女人，用以建立控制性的道德規範和秩序；勞動階級的女性則被鼓勵為了國家更大的目標到海外工作，體現跨國馴化的過程（Silvey 2004）。印尼政府關照中產階級婦女的利益，以促進性別平等；與此同時，卻將勞動階級女性置於缺乏保護、隔離的聘僱場域。學者指出，儘管移工對印尼國家經濟的發展貢獻重大，但印尼政府缺乏適切回應他們需求的政策和措施，特別是女性移工（Dewi 2011）。

（二）暫時性的遷移體制：臺灣的看護移工政策

許多亞洲的勞動力接受國將移工的跨國流動視為經濟發展的策略，立基於嚴格的暫時性工作簽證，移工被視為彈性的、可拋棄的勞動力，從事本地公民不願意投入的工作（Wickramasekara 2002），臺灣的移工體制遵循相同的政治和經濟邏輯。

臺灣的移工政策以客工制度（guest workers scheme）為基礎制定，主要法源為 1992 年公布的《就業服務法》，其將外籍勞動者區分為兩類，第一類從事專門性與技術性的工作；第二類從事勞動性質的工作。藍領移工屬第二類外國人，在招募、居留身分、勞動條件、工作轉換和健康檢查等，受到不同於第一類外國人的政策規範。臺灣政府將移工定位為暫時性、補充性勞動力，並採「限量限業」的原則，希望能控制移工整體的數量以及工作的行業別。移工聘僱採定期契約，三年為一期，期滿後可以續約。2016 年，臺灣政府修改《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移工「工作滿三年至少離境一日」的規定。移工在臺灣最長的工作年限為 12 年，家庭看護移工為 14 年，之後，他們不得再以工作簽證入境臺灣。³ 暫時性的遷移體制除限制移工在臺灣最長的工作年限，移民政策的設計令移工難以取得永久居留權，甚至進而申請歸化為臺灣公民，他們在臺灣工作期間，不能和臺灣公民結婚，未享有與家人團聚的權利，換言之，他們的母國家人無法同行。

客工制度下，移工在臺灣合法居留身分立基於和特定雇主的定期契約，他們處於不完全自由的勞動市場，轉換雇主困難（李有容、鄭杏茹 2018）。《就業服務法》的基本原則為「禁止自由轉換」；2003 年改成取得雇主同意和勞動部許可後，准許同業別的轉換；2008 年再開放持有招募函的雇主可跨行業別承接聘僱；2021 年 8 月因疫情的緣故，取消跨行業別的轉換。僅管臺灣政府鬆綁移工轉換雇主的限制，⁴ 暫時性的遷移體制和定期的契約工作，仍形塑移工和雇主間不平等的聘僱關係，以及他們在勞動市場的特定位置，造成移工無法順利轉換、延長工作年限，或是面臨工作年限期滿時，容易成為「非法」移工。學

3 參見註腳 1。

4 《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轉換雇主或工作：一、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者。二、船舶被扣押、沉沒或修繕而無法繼續作業者。三、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者。四、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

者 Xiang (2013) 將暫時性的勞動遷移視為非志願、強制返回 (compulsory return) 的過程，跨地、跨時切斷移工在不同層面的社會生活連結，並持續形塑他們危脆的處境。

暫時性的遷移體制需要嚴格的國境管理，以確保移工居留身分的有效性 (Piper 2022)，接受國的政府經常將管理的責任外包給私人仲介和雇主 (Yeoh and Chee 2015)。臺灣政府透過規定移工住所的方式，限制他們的自由，移工在臺工作期間必須居住於雇主指定或安排的住所，家庭看護移工則通常須與受照顧人同住。政府規定，一旦家庭看護移工行蹤不明 (逃跑)，雇主要等三個月之後，才能重新申請新的看護工，藉此將對移工管理的責任，轉移到雇主身上。既有的研究發現 (Cheng 1996; Liang 2011)，雇主為避免移工失聯後造成的影響，他們會透過仲介或是自行加強對移工的管理，例如：限制放假時間、管理住宿門禁等。

目前家庭看護移工並不適用於《勞動基準法》，他們勞動條件的規範與保障，取決於和雇主間的私人契約。家庭看護移工與幫傭曾於 1998 年 4 月至 1999 年 1 月，短暫地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後來當時中央改組為勞動部之前的勞工委員會，以家務勞動的特殊性以及工作時間難以規範，中止《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相較於本地勞工以及產業移工，她們的工作被視為非正式勞動、較不具有經濟價值。她們所從事的照顧工作被瑣碎化為不需技能的愛心活動或慈善付出 (Liang 2014)。家庭看護移工提供 24 小時的照顧服務，但卻沒有明確的法令規範她們工作與休息的界線，包括例行休假。私人家戶做為看護移工工作的場域，仍被看待為私人的、非正式的空間，使得國家公權的介入以及正式的法律保護倍加困難。同時，政府的長照體系提供家庭照顧者喘息

服務，但聘僱看護移工的家庭，卻被排除在喘息服務之外。⁵ 家庭看護移工因為位於性別化、族群化隔離勞動市場的邊緣位置，相較於產業類別的移工，她們的經驗有其獨特性。

三、（再）概念化母職：跨國母職實作、策略和心理矛盾

從歷史跟文化脈絡的角度，學者認為母職涉及一組關係，一方提供滋養、照顧另一方（Jaggar 1983: 256），強調母親和孩子間個人層次的動態互動，形塑和強化兩者間緊密的連結（Oberman and Josselson 1996）。母職也包括一系列的實作：預備、養／教育和訓練孩子得以進入成年生活（Ruddick 1995）。但母職（mothering）具體的內涵是什麼？包括哪些實作的面向？母職並沒有標準的操作化定義，不論是在大眾媒體、學術論述或是法律領域，母職向來是充滿爭議的概念。過去幾十年間，女性主義學者成功挑戰母職的本質論，從社會建構的觀點指出，母職並非生物或是血緣決定，而是存在於特定的社會脈絡，受到特定的物質、文化資源所限制，以及特定的性別關係所影響（Glenn et al. eds. 2016）。同時，族群／種族、階級與文化等變異性與日常實作交互作用，形塑母職的多元樣貌。

女人是行動的主體，藉由育兒過程中與小孩和他人的互動，展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性。一方面，她們的育兒實作必須符合社會文化對於母職的要求和期待；另一方面，她們以自身真實的經

5 衛生福利部和勞動部共同推動「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擴大喘息服務計畫」。目前聘有家庭看護移工之受照顧者，經評估屬長期照顧需要第二級至第八級者，可申請喘息服務，並於2023年開始實施「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參見衛生福利部，2020，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擴大喘息服務計畫，<https://www.mohw.gov.tw/cp-4625-56931-1.html>，取用日期：2023年9月6日。勞動部，2023，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實施計畫，https://www.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D33B55D537402BAA&sms=02E58F84AD3F3884&s=58A8E69336C8269C，取用日期：2023年9月6日。

驗，協商建制的標準。在暫時性遷移體制的脈絡下，女性移工必須藉由動員物質與非物質的資源，發展多元的母職實作策略，以協商結構的限制、擴大母職的內涵，並呈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性。資訊與通信技術的發明和普及，影響女性移工的母職經驗，不僅改變她們與小孩的互動方式，也可能帶來新的困難和挑戰。以下文獻討論女性移工如何進行遠距母職實作，以及資訊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以下簡稱 ICTs）如何做為跨國照顧重要的媒介，和過程中她們的心理矛盾。

（一）身體缺席下的母職實作策略

全球照顧鏈的概念勾勒的不僅是照顧人力的流動，也包含第一世界國家對第三世界女性情感的榨取（Hochschild 2001）。研究發現，身為母親的女性移工，一方面經歷與小孩分離的情感痛苦、愧疚和自責；另一方面，因對雇主小孩產生情感的投射，造成內心的弔詭（Lan 2006）。這些跨國移動的移工母親多強調身為母親的責任，將海外工作詮釋為「為孩子」、「為家庭」而做的犧牲（Tyldum 2015），她們必須壓抑自身的情感、合理化與孩子的分離，但母親的身分又使得長時間的離家更為辛苦和不易（Boccagni 2012）。

海外工作迫使女性移工得在家庭日常中缺席，但並不意味她們無法進行遠距離的母職實作和關係維繫，反而提供她們重新定義母職的機會與可能（Dewi 2011）。以菲律賓女性移工為例，她們發展出各式策略，克服跨國母職所形成的文化矛盾並參與母職實作。Parreñas（2001a, 2001b, 2005a, 2005b）的研究闡述女性移工如何維持跨國母職，她提出「愛的商品化」和「技術性管理」的概念，描繪女性移工透過匯款、購買禮物、打電話給孩子、密切聯繫孩子的替代照顧者等方式，一方面表達她們對子女

的情感、實踐照顧責任；另一方面，凸顯雖然她們無法在孩子的身邊，仍（被期待）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特別是子女的照顧（Dreby 2006）。藉由這些策略，她們證明自己符合母國傳統性別規範所界定的「好媽媽」形象。

然而，根據研究觀察與訪談資料，Parreñas（2005a: 333）指出不論是藉由匯款、購買禮物或是電話通訊，僅能維持表面的家庭親密性，她主張這些形式無法取代身體接觸帶來的喜悅，以及基於身體親近性所產生的熟悉感。Parreñas（2005b）認為母親的海外工作，造成她們母國子女長期經歷情感上被忽視的痛苦。不過，其他的研究有不同的發現。McKay（2007）批判Parreñas對於親密性的理解過於西方中心——親密性的要件為長期、密切地面對面互動。藉由菲律賓女性移工的經驗，她呈現經濟交換和情感的親密性不應被視為衝突、二元的概念或實踐，而是相互交織、連結。Fresnoza-Flot（2009）亦指出，匯款不只涉及金錢的轉移，匯款做為母職實踐與母愛表現的策略，不僅擴大母職的內涵（涵蓋養家者的角色），也包括日常生活的照顧實作。金錢，「是表達關愛與責任的機制之一」（Singh 2006: 378）。Katigbak（2015）以情感匯款（emotional remittances）的概念，討論在跨國家庭的實作過程中，情感與經濟的混合和相互關聯性（Coe 2011），藉由研究菲律賓移工的母國社區，她呈現鑲嵌於其中的愛、責任、義務和互惠。這些研究指出：愛與物質不應被視為對立的概念，同時，二元的分析架構難以捕捉跨國母職實作的動態與複雜的意義性。

女性移工在海外工作期間，多數由其他女性家庭成員照顧她們留在母國的子女（Parreñas 2005a）。移工母親的匯款除用於母國家庭的日常生活基本所需，還包括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特別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或是大學，以及購買具有階級象徵意義的房子、土地或是汽車。Fresnoza-Flot（2009）的研究發現，菲律

賓女性移工的照顧安排立基於和其他女性家庭成員的互惠關係，她們提供孩子的替代照顧者直接或間接的物質補償。女性移工透過匯款，展現她們對留守家庭成員的承諾，她們希望藉此確保孩子能受到妥善的照顧（Thieme and Wyss 2005）。因此，移工的海外匯款除了能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做為遷移勞動的具體成果外，同時具有維持、穩定家庭關係的功能。

在勞動力跨國遷移的脈絡下，金錢或禮物等物質被賦予社會性的意義，移工媽媽們藉此表達對留守母國子女的愛和情感，或做為與孩子的替代照顧者建立、強化互惠關係的重要基礎，以保障孩子的身心福祉。透過物質與人的協作，這群女性移工豐富並拓展母職與照顧的內涵。

（二）資訊與通信技術（ICTs）做為母職實作的重要媒介

資訊與通信技術的發明和普及，為維持跨國家庭關係與情感交換提供了關鍵的媒介（Wilding 2006）。ICTs 不僅有助於形塑虛擬共存（virtual co-presence），更增進聯絡、資訊交流和匯款活動，也包括生活形式和價值的傳遞與分享（Nedelcu 2012; Madianou 2012, 2016; Baldassar 2016），並重新形構遠距脈絡下的親密關係（Francisco 2015）。Wilding（2006）指出，透過 ICTs，使用者能感受到共享的空間和時間，彼此間的親密感也更加具體、真實。然而，Acedera 與 Yeoh（2019）的研究發現，藉由語音或通訊技術所達成的立即、同時的溝通並不能等同於同時性（simultaneity），她們引用 Cwerner（2001）的主張，強調移工、移民與他們的留守家庭如何能持續協商特定的生活方式，使得遷移的期待與家庭的目標能共存時，共感同時性才有可能。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提供機會反思以 ICTs 為媒介的虛擬

共存，是否足以做為親密關係的基礎？或進一步取代身體的親近性？特別是在生命的重要階段、危機發生，以及遭逢其他關鍵的事件時（Boccagni 2012; Merla et al. 2020）。

跨國溝通是女性移工維持與母國家人關係和實踐母職重要的策略之一，隨著科技的進展，她們使用的媒介從早期的紙本信件、電話（Horst 2006）、網路到 ICTs，科技的普及不僅改變溝通的物質基礎、擴大母職的實作內涵，也讓跨國母職的實踐得以可能（Peng and Wong 2013; Chib et al. 2014）。ICTs 不只做為情感聯繫的媒介，更居中協調了匯款活動，包括日常的經濟需求、孩子的學費、債務、儲蓄和投資等等（Parreñas 2001a）。這些金錢的流動被視為跨國家庭「做家庭」的方式之一。

討論女性移工如何以 ICTs 為媒介進行跨國母職的研究，呈現科技的運用改變母職的內涵和實作策略。這些研究同時指出，以 ICTs 做為照顧媒介存在的弔詭和衝突：一方面移工媽媽藉由 ICTs 維持她們與留守孩子、伴侶以及家人的聯繫和關係，並保有她們母職的角色、其他家庭內的身分和對家庭生活的持續參與，進而提升她們對於跨國／時實踐母職的信心（Carling et al. 2012; Madianou and Miller 2013）；另一方面，ICTs 所媒介的虛擬共存，並無法完全取代身體的親密，很多時候，視訊和即時通信等日常例行活動，在在提醒移工媽媽，她們和家人、孩子持續分離的現實，甚至加重她們因無法符合性別文化期待的愧疚感。同時，對留守母國的孩子而言，他們經驗到的可能是對日常生活的干擾（Parreñas 2005b），或是未能感到例行通訊帶來的親密性和必要性（Boccagni 2012）。在跨國照顧的脈絡下，移工母親與她們孩子使用 ICTs 的經驗，不僅呈現科技如何改變親密關係的實作與情感連結，也反映科技使用的有限性和其中的關係不對稱。

遷移的動機與意義是什麼？其帶來的影響為何？本研究聚焦

於育有子女的女性家庭看護移工，檢視母親的身分如何影響她們的遷移經驗，同時遷移又如何形塑她們的跨國母職。立基於既有的基礎，本研究強調 ICTs 做為重要的媒介，強化勞動力遷移造成的空間與時間的重組，並形塑跨國母職實作過程中交錯的複雜和動態，涉及物質和愛、移工母親、母國子女和家人，以及情感關係和鑲嵌的不對稱，凸顯物質／愛、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等二元概念難以描繪她們日常的真實經驗，以及她們處於其中的心理矛盾。

四、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闡述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在跨國遷移脈絡下的母職實作經驗，因此研究參與對象招募的設定為至少育有一位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移工，納入不同的婚姻狀態和來臺工作的年資。長期以來，我的研究參與對象為家庭看護移工，在不同的時期，聚焦於不同面向的探究。本文的訪談對象，部分來自於我早先研究階段認識的印尼移工，其餘則透過滾雪球、於印尼店張貼招募文宣，以及協助本研究語言翻譯的印尼婚姻移民介紹。本文的資料來自於 28 個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訪談。同時，輔以參與觀察的田野筆記，包括：每週一次的華語課、⁶ 放假日參與移工的出遊，以及平日午後在社區活動中心前或是廟埕前的聚會。

受限於家庭移工的日常作息多以受照顧者為中心，以及必須配合家務工作，訪談彈性的安排在他們方便的時間，例如：被照顧者午睡時、她們與受照顧者一同外出的早晨或是午後。由於她們空檔的時間經常零碎、片段，且會因受照顧者的狀況需求而被中斷，像是年長者會突然說想要回家，因此，訪談的次數通常為

6 我以每週一次的頻率，到社區據點提供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華語課程，維持近九個月，直到 2020 年臺灣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二至三次不等。訪談問題包括四個面向：(1) 個人家庭背景資訊；(2) 她們來臺灣之前的工作經驗（包括其他國家的遷移史）以及她們的遷移動機；(3) 她們在海外工作時，子女的照顧安排、與其他家人間的育兒照顧協作，以及(4) 她們與子女的互動、情感關係以及如何維持關係。訪談進行時，有精通官方印尼語、爪哇語和華語的翻譯協助，雖然有少數的受訪者之母語非爪哇語，但可以說流利的印尼官方語。我們鼓勵受訪者以她們偏好的語言回答，多數使用印尼語，參雜華語，亦有部分華語流利的受訪者選擇以華語作答，表達需要時，搭配印尼語。在說明研究目的與徵求研究參與對象同意後，我們開始訪談並錄音，所有的錄音檔皆謄打為逐字稿，做為發展分析之用。本文寫作已變更受訪者的真實姓名，謹守研究倫理匿名與保密原則。

28 位研究參與對象中，有 21 位來自爪哇島的鄉村地區，包括西爪哇、東爪哇和中爪哇，6 位來自蘇門答臘島，僅 1 位來自雅加達市的郊區。她們的年齡介於 29 歲至 48 歲之間，其中 18 位已婚、9 位離婚，以及 1 位的先生過世。她們育有一到三位小孩不等。印尼鄉下的居住安排，婚後尚沒有能力蓋房子的伴侶通常會跟父母同住（通常是女方的家庭），或是與父母、親戚比鄰而居。

大多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在臺灣工作的時間為 8 到 13 年，少部分未滿 3 年，來臺灣工作之前，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有到其他國家工作的經驗，包括阿拉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她們在海外工作的期間，多數的人由原生家庭的母親照顧她們留守的小孩，成為小孩的替代照顧者，她們的先生或是其他家庭成員，例如姊妹或是妯娌，也參與在共同照顧的網絡中。受訪者中，有 3 位的孩子是由她們的姊妹照顧，6 位是由先生或是前夫（僅有 2 位）在其他家庭成員提供協助的脈絡下，提供孩子日常生活照顧。

五、遷移做為母職的實踐

印尼的性別文化認為女人做為母親和妻子的角色，是家庭重要的核心，是否能支持丈夫的成功和孩子的教育表現，是用以評斷「理想母親」的重要標準（Machali 2001）。然而，學者指出，「理想母親」的概念未必能反映真實的狀況，特別是鄉村以及海外工作女性的處境，她們往往得藉由有酬工作，實現母親的責任和對孩子的支持（Suryakusuma 2004）。跨國遷移造成物理空間與時間的重組，本研究關注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為回應印尼社會傳統的性別體制對理想母親角色的期待，她們連結跨國勞動遷移與母職實踐，重新協商與定義何為適切的母職內涵（Parreñas 2010），並鬆動養家者與照顧者的二分框架（Paul 2015）。

（一）海外工作是對孩子的照顧

仍處於婚姻關係的 18 位研究參與對象中，有 3 位的先生同時在海外工作，其他則是留守印尼，多半從事薪資低、不穩定的工作，僅有少數幾位在沿海養殖魚或蝦，相比下，收入較為不錯。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皆表示，她們在臺灣工作的薪水是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談及遷移動機時，她們除了指出經濟需求外，更強調是為了照顧孩子。但同時，海外工作也讓這群移工媽媽經歷無法提供孩子直接身體照顧的母職心理矛盾。

Reni 出生於東爪哇的農人家庭，家中有四個小孩，她排行老二，上面是姊姊，底下是弟弟和妹妹。幅員廣大的東爪哇，因為貧窮、缺乏工作機會，從以前就有向外遷移的傳統。2009 年，Reni 離家到臺灣，這是她第一次到海外工作，那時女兒還沒兩歲，由她的姊姊代為照顧，先生因為工作的緣故，在本地租屋。訪談時，Reni 已經在臺灣工作超過 10 年，說起女兒，她的神

情有點哀傷：「她很小的時候就給我姊姊照顧，她現在都不大想我，她比較愛我姊姊，都不愛我。」

高中畢業後，Reni 在離家半個小時車程的大賣場工作，月薪換算成臺幣約 3,000 多元，她說，這樣的收入，單身一個人時，還可以過得去。結婚後，她辭掉工作，先生依然從事麵包零售的工作。說起來臺灣工作的動機：

結婚後，我們在工作的城市租房子，但我先生的薪水很少，不夠家裡需要。特別是我的女兒出生後，我們還得買奶粉、尿布和很多東西，要花的錢變多，老公薪水很少……。

Reni 提出出國工作的想法時，先生並不贊成，最後她以女兒為由，說服先生。她在臺灣工作的期間，負責女兒所有的花費，從日常基本所需到奢侈品，像是手機。先生大概一個月到姊姊家看女兒一次，賺的錢就是維持他自己平日的花費，存不了錢，也沒有餘裕分擔孩子的開銷。Reni 和其他研究參與對象皆指出金錢是遷移的動機，現實上，她們多數是家裡主要的經濟來源，但訪談時她們更常以照顧的語彙來詮釋海外工作的選擇，⁷ 像是：「我們要為小孩想」、「我要照顧小孩」和「我是媽媽啊！」遷移的決定，鑲嵌於她們的母親身分認同和母職實踐。

Dari 的家鄉在印尼東爪哇的鄉下，那裡多數人以務農維生，種米、種菜，過著「勉強可以過日子，但存不了錢」的生活。婚前，她來過臺灣照顧阿嬤，婚後還沒小孩時，她和先生又分別到香港和馬來西亞工作，直到她在香港的兩年合約期滿，他們約定結束分隔兩地的生活，回到印尼。爪哇的鄉村沒有什麼工作機

7 僅有少數，像是 Misrati 講述因為無法處理她和先生親密關係瀕臨破裂，促使她選擇到海外工作，以逃離做為策略。

會，他們只能承襲家裡務農的傳統。孩子出生後的開支，破壞原本勉強維持的度日平衡，三個月採收一次的農作物，販賣後的收入僅夠每天吃飯、買菜，沒有多餘的錢照顧孩子每天張口的需求，更不敢想像他日漸長大的教育費用和相關開銷。Dari 說，和臺灣相較，先生在馬來西亞的工作收入少，兩人討論後，由她到臺灣工作，她說：「先生沒有反對，他知道我是到臺灣賺錢的。」離家時，小孩五個月大，Dari 想起多年前的決定，眼眶忍不住泛紅：「沒辦法，為了我的小孩（到臺灣工作）。」

研究參與對象中，也有和 Yenny 一樣，因為離婚，得同時肩負養家和育兒照顧的責任。Yenny 的家在西爪哇，距離雅加達約九小時車程的小村子，父母以務農維生，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婚前，她在雅加達的糖果工廠工作，也在那裡認識前夫。孩子出生後，她搬回老家和父母一起住，剛開始，前夫每個月會探望她和孩子一次，頻率越來越低，孩子一歲時，他們已經完全斷了聯繫。在許多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家鄉，女人到海外工作的現象很普遍，已經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Chan 2017），但 Yenny 的村子，很少有女人出國工作，她說，大家選擇到附近城市的紡織工廠上班。2010 年，小孩 20 個月大時，Yenny 到阿拉伯工作，直到 2018 年才回到印尼，休息六個月後，⁸ 她再度離家到臺灣工作。講起出國工作的決定，她簡單地回答：「因為要養孩子」後，眼淚就掉了下來，回憶在阿拉伯工作八年，沒有一日休假的生活，她說：「我只能認真工作養孩子。」

幾乎所有研究參與對象講到海外工作的動機時，都會提及孩子和自己做為母親的照顧責任。訪談時，鮮少有人將出國賺錢看待為實踐自身夢想的機會，她們冀望經濟改善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滿足孩子的生活所需和消費的慾望、興建一家人可以居住的房

8 包括在訓練中心四個月的時間。

子，以及以下小節討論的「更好的未來」。決定出國工作之初，多數人以「暫時的分離」，可能是合約期滿的三年，或是年幼子女的某個階段（例如：就讀小學前、小學畢業時），計畫現在和未來的安排，她們也以未完成的家庭任務或是孩子的照顧責任，解釋延遲的返家規劃或是再一次出國工作的動機。跨國遷移不僅帶來物理空間的距離，也重新形塑這群移工媽媽對於時間性的感知，進一步模糊現在／未來、暫時／永久的二分框架。

既有的研究指出，海外遷移為女性帶來經濟獨立的契機，伴隨家戶權力關係的改變（Hugo 2002; Rigg 2007）。本研究確實發現印尼家庭看護工的經濟能力，使得她們更有權力參與家庭的決策過程，甚至是主導，包括：蓋房子、買地、醫療安排以及孩子的教育等等。但受到印尼傳統性別文化的影響，本研究的參與對象更強調藉由賦予海外工作母職照顧的意涵，協商她們在跨國遷移脈絡下不能體現「理想母親」的心理矛盾。

（二）教育是通往「更好」的未來

多數的研究參與對象來自印尼鄉村的農家，她們父母務農的所得只能勉強維持家庭基本的日常所需，少數甚至還得靠借貸度日，沒有多餘的消費能力。回憶童年，有人會想起下雨天，滴滴答答漏水的舊房舍，有人說起家裡耕種的地是承租而來，收成的作物上繳地主後，剩餘的收成僅夠自家吃飯。她們無奈地說，爸媽工作很辛苦，但卻賺不了什麼錢，突然而來的天災，讓家裡的狀況雪上加霜，貧窮是她們的共同記憶。

因為反思自身成長過程的物質貧瘠和其影響，部分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工會以「買想要的東西」為理由，說服孩子接受媽媽到國外工作，多數的人進一步提到對「更好」的生活的期待。她們會以暫時的離別或是犧牲對照可能的未來，偶爾會提及老年生

活的安排，身為母親的她們，口中的未來常等同孩子的未來。「更好」指的不只是物質的富裕，更涵蓋安全、穩定以及有希望。

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工的教育程度多為國中和高中，少數在小學畢業後就因須協助家庭經濟無法繼續升學。訪談過程或我們日常互動時，部分的人會因自己未能接受更高的教育表露遺憾，或是提到教育程度時顯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們多數相信接受教育能讓孩子過跟自己不一樣的生活。不少人選擇讓孩子在小學畢業後進入寄宿學校，和公立學校相較，儘管不便宜的學費成為每個月壓力，她們強調：「孩子願意讀書很重要。」、「為了他（們）以後好。」

Dari 來臺灣十多年，負責一大家子生計的她，手邊沒有任何的儲蓄，因為無法負擔機票費用，已經六年多沒有回家。女兒小學畢業時，她不顧所有家人的反對，堅持安排女兒到穆斯林寄宿學校就讀，她解釋：「我人不在家裡，不知道女兒會不會出什麼狀況，她爸爸人很好，管不動她……。」Dari 說，村子裡的鄰居也在臺灣工作，女兒國中就懷孕了，後來書也沒有讀完，她擔心自己不在身邊，女兒會受到同儕朋友的影響，沒法好好讀書。Dari 只有小學畢業，她偶爾會感嘆學歷造成的限制：「印尼鄉下的工作很少，我只有小學畢業，更不可能找到薪水高的工作。」有段時間，Dari 為女兒的學習態度不佳煩惱，某個休假的星期天，在我的車上，她忍不住掉了眼淚：「我在臺灣工作那麼辛苦，賺錢不容易，學校那麼貴，小孩還不聽話……。」後來我們見面時又聊起女兒的近況，她露出欣慰的笑容：「她最近乖很多，也有好好讀書。」

Any 的父親以種植稻米和玉米維生，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收成的四分之一必須繳交給地主，做為租金。國中畢業後，因為父母無法繼續負擔她的學費，也需要有人分擔家庭日常支出，透

過親戚的介紹，她在離家車程約 10 到 12 個小時的萬隆找到家庭幫傭的工作。

我們家非常的窮。16 歲的時候，我開始在萬隆的華人家庭擔任幫傭和保母，負擔家裡的生活費和弟弟妹妹們的教育。一直到我結婚以前，我每個月的薪水都寄回家給我媽媽……。我的弟弟和妹妹都讀到高中畢業，只有我是國中畢業。

回想自身的成長過程，Any 和其他受訪的家庭看護移工常強調，到臺灣賺錢是為了避免孩子和自己一樣辛苦（生活），物質缺乏或是被迫中斷學業。Any 對於因家庭經濟因素未能繼續升學，感到遺憾。在我們一起慶祝她的大兒子獲得高中名校的入學許可時，她說了好幾次，兒子即將要就讀的學校，每年都有很多畢業生進入印尼最頂尖的大學，通往和 Any 自己不一樣的、滿有希望的未來。

Wati 的家鄉在中爪哇鄉下，她 19 歲時生下女兒，前夫的工作一直很不穩定，經常處於失業的狀態，女兒九歲的時候，她決定到臺灣工作。我們認識時，她已經來臺灣工作超過 10 年。這期間，她幾乎沒有休假，每個月的薪水留下一、兩千元給自己，其他全數匯給在印尼的媽媽，用於生活開銷和女兒的教育費用，訪談時，Wati 的女兒正在大學就讀護理系。講起女兒時，Wati 的神情帶著驕傲，她說，在印尼找工作不易，女兒的專業能找到比較穩定的工作。Wati 在臺灣工作的最後階段時，女兒已經從大學畢業，在醫院實習，她的手機桌面是女兒捧著一大把花束，笑得燦爛的畢業照片。Wati 說：

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樣過得這麼辛苦……。印尼的大學學費非常的貴，除了學費之外，她每個月還需要買書、實

驗用的材料、房租以及其他的生活花費。我花了很多的錢，但是很值得。

不論是 Wati、Dari 或是 Any，她們和許多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懷抱相似的想法和心情，身為母親的她們，視教育為孩子通往（相較於自己）更好、有希望的未來的重要管道，在海外辛苦工作生活的現在，把希望寄託於正在成長的孩子以及他們人生無限可能的未來。

六、跨國／時做媽媽的策略：空間與時間性的重組

上述提及，參與本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從照顧責任、實踐母職的觀點，來詮釋海外工作的決定。在跨國勞動力遷移的脈絡下，她們藉由匯款、禮物、安排照顧代理人 and 以資訊與通信技術（ICTs）媒介的日常通訊，表現母愛、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維持情感關係、協商缺乏身體親密性的母職實作，以及和母國家人發展照顧協作關係。ICTs 不僅是她們實踐跨國母職與照顧協作的重要媒介，也改變遷移脈絡下的物理空間感與時間性。

（一）物質做為情感的表現與日常生活參與

本研究訪談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數是母國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不論她們先生的受僱狀態和薪資。談及薪水分配時，她們往往只留下 2,000 至 3,000 元的現金，因應自己在臺灣的花費，匯款除用作蓋房子的基金、支應家庭生活開銷、孩子的教育費用、村子裡婚喪喜慶的祝賀或慰問金，還包括滿足孩子日常裡大大小小的慾望，藉此在物理空間與時間限制下，持續參與母國家

庭的例行生活。

訪談時，Yenny 的孩子已經 10 歲，前後加起來，她陪伴在孩子身邊的時間不到三年。講起孩子上次考試拿到全班第二名時，她的神情有驕傲，也有不捨：「爸媽都不在，我的兒子還是很用功、表現很好。」每個月，Yenny 的姊姊收到匯款後，會拿印尼盾四萬元（約臺幣 80 元）給她的孩子當作零用錢，她解釋：

他跟我說同學有玩具汽車，他也想要，但是我不在……。後來，我請我姊姊每個月給他錢，放學後，他如果在雜貨店看到什麼他想要的，可以自己去買。他很喜歡玩具汽車，每個月會去買一臺。

身為同時肩負養家和照顧責任的單親媽媽，Yenny 講起海外工作的選擇時，流露對孩子的愧疚，儘管不在孩子的身邊，她總是想辦法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或慾望，可以支配、使用的金錢，是她想到的方法之一。Yenny 說，有時候孩子會略過她的姊姊和爸爸，傳訊息告訴她想吃的東西：

有一次他 teks（傳訊息）給我，說在 FB 看到別人吃 pizza，他也想吃，我就在網路上訂，店會送到家裡。（為什麼不跟妳姊姊或是爸爸說？）他知道阿姨或是阿公可能不會答應他，覺得浪費錢，吃家裡（的飯）就好，為什麼要吃 pizza。

Yenny 長時間在海外工作，講起和兒子的關係並不親密時，她幾度落淚，但又無力改善。每個月給兒子的零用錢或是為他購買想要的東西、想吃的食物（例如：訂披薩），是她在身體缺席的情境下，得以藉由物質現身、參與兒子的日常生活，用以協商母職實踐的策略。

我認識 Anita 那年，她 30 歲，女兒快五歲時，她離開西爪哇的家鄉到臺灣工作，訪談時，她已經在雇主家工作五年，扣掉按時匯款給先生的家用，她沒有任何的儲蓄。女兒小學畢業後，Anita 堅持送她去昂貴的寄宿學校，每個月的學費讓原本緊縮的經濟狀況更難以負擔。有回，Anita 以女兒學費為由，跟其他印尼看護工朋友借款，後來被揭穿她用那筆錢為女兒在學校辦了盛大的生日派對，謊言傷害了朋友間的友誼和信任，她泣訴：

我不是故意要騙大家，我真的沒有錢了，沒辦法……。
女兒跟我說她想要在學校有 pesta（派對），想跟朋友一起慶祝。她剛去學校的時候，很不習慣、很不開心，現在比較好了。我希望她可以開心。

Anita 在臺灣工作的薪水，雖然能支持母國家庭固定的日常開銷，但並沒有讓她在經濟上更有餘裕，部分受訪的印尼看護移工也有類似的困境。儘管如此，滿足女兒的物質要求，是少數她能以媽媽身分參與女兒生活的方式。Yenny、Anita 和其他受訪的移工媽媽，不只以物質表達她們對孩子的愛，也藉以在跨國遷移的脈絡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連結雙方所在的空間與時間，受到身體缺場的限制，物質成為她們表達情感、實踐母職的重要媒介。

（二）與照顧代理人的協作

尋找適合的照顧代理人是跨國母職實踐的重要策略之一，參與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與代理人發展照顧協作的過程中，代理人投入的程度、時間和心力影響她們的母職實作經驗。她們經常透過物質建立與強化互惠的基礎，除了表達感謝，也有助於照顧協作的順暢以及保障孩子的身心福祉。受訪者在海外工作期

間，原生家庭的母親和姊妹是孩子主要的替代照顧者，僅有六位由先生或是前夫在其他家人協助下，進行照顧。提及如何安排孩子的照顧代理人時，她們強調與代理人間的情感、信任，以及代理人具備的重要特質：可靠、值得信賴、願意付出愛、細心等等。多數的人將每月薪資的匯款交由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安排，用作家庭的基本開銷和孩子的教育費用，她們口中的「家庭」多半以孩子為中心，納入協作網絡內的照顧代理人。

Sudi 的家鄉在蘇門答臘的鄉下，臺灣是她第二個海外工作的國家，之前去過馬來西亞。訪談時，她在目前的雇主家工作了七年，照顧阿嬤（雇主的媽媽）。Sudi 有兩個兒子，大兒子 20 歲，小兒子 12 歲，不在家的期間，她的母親代為照顧兒子，直到現在，小兒子晚上還是喜歡跟 Sudi 的媽媽一起睡覺。不過，Sudi 的媽媽年紀日漸增長，健康狀況不是很好，妹妹會協助、分擔孩子的照顧。每個月拿到薪水後，扣除自己需要的花費，Sudi 會將剩餘的部分匯款至妹妹的銀行帳戶，再由妹妹代為分配：父母和孩子的生活費用、自己的銀行儲蓄，以及給妹妹的經濟資助。她說：

我妹妹有幫忙照顧孩子，我平常（每個月）會給她（印尼盾）50 或 60 萬，她需要的時候，會給她 100 萬，我是姊姊……。

Sudi 認為協助妹妹是她身為姊姊的責任，同時，強調妹妹幫忙照顧她的孩子，金錢匯款成為她們互助、互惠的基礎。

Reni 在臺灣工作的十多年，女兒由姊姊照顧，關係十分親密，姊姊有個就讀高中二年級的兒子。Reni 每個月固定給姊姊臺幣 4,000 元，用於女兒的開銷，剩餘的部分由姊姊支配。她也會不定時額外再給姊姊錢，或是資助其他生活上的需要，像是：

「印尼念小學比較便宜，國中和高中之後花費就比較多。姊姊需要時，我也會多寄錢給她。」Reni 有兩個年紀較小的弟弟和妹妹，還在就讀高中和國中，父母務農的收入不高，生活過得很勉強，她每個月給父母臺幣 2,000 元，以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講起薪水的分配，她以做為女兒的責任詮釋給父母的匯款，強調和姊姊之間互惠的關係。Reni 的手機裡有張照片，女兒畫上精緻的妝容、穿著華麗的傳統服飾，是參加舞蹈表演時的留影，看著照片裡亭亭玉立的孩子，她感嘆道：

她（姊姊）幫忙照顧我女兒很辛苦，女兒喜歡跳舞，姊姊幫忙準備（衣服）、帶她去練習……，我只有賺錢。姊姊需要的時候，我會幫忙。

不管是金錢或是禮物，受訪的家庭移工藉由物質建立與強化跨國照顧協作的互惠基礎，傳達她們對母國家人（特別是照顧代理人）的情感、愛和感謝，實踐與協商她們做為母親的責任。

（三）資訊和通信科技媒介的母職：情感維繫和跨國照顧協作

臺灣的遷移體制並未保障移工家庭團聚的權利，其工作簽證無法贊助母國家人在臺灣的居留，他們多半利用聘僱契約期滿時，返國和家人短暫相聚。不過，在臺灣政府取消移工「工作滿三年至少離境一日」的強制規定後，⁹ 部分移工因為經濟能力的考量，選擇延後與家人團聚的機會。研究（Mason 2004）指出，移民工定期和家人間的互訪、相聚，是跨國維持家庭關係的重要策略，但以身體親近性為基礎的互動和情感連結，在臺灣的移工政策限制下，備受挑戰。移工不僅運用資訊和通信技術（ICTs），做

9 2016 年 10 月 21 日，立法院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移工 3 年契約結束後，需出國至少一日才能再入境的規定。

為跨國母職實作和維繫情感關係的重要媒介，並藉由整合科技物進行照顧協作，展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性。ICTs 的使用重組跨國遷移造成的物理空間感和時間性，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們的經驗呈現 ICTs 做為重要的媒介，如何讓跨國／時的家庭日常生活參與得以可能，並進一步連結情感關係。

1. 以資訊和通信技術為媒介的日常互動

過去 20 年來，ICTs 的發展以及網路的普及，改變移工和母國家人的聯繫方式、情感的維持，以及她們實踐母職的策略。¹⁰ 現在，網路視訊是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最常用以與母國家人聯繫的媒介，另外會輔以網路語音電話和文字訊息，少數的移工會藉由社群媒體（例如：臉書）和年紀較長的子女互動，或是瞭解他們的近況。和所費不貲的國際電話相較，ICTs 的普及和價格的可負擔性，大幅提升看護移工和母國家人維持日常溝通、聯繫的能力。來臺近 10 年和超過 10 年的受訪者多半可以比較箇中的差異。來自印尼東爪哇鄉下的 Supami，父母早逝，受訪時已經來臺灣 11 年，她回憶早期沒有網路時，會利用國際電話卡打折的星期日和家人通話，一張三、四百元臺幣的電話卡只有短短二、三十分鐘的通話額度。她說：「我會打給老公，問他兩個孩子和住在一起的婆婆的狀況，小的（孩子）那時候還不懂事，會跟大的（孩子）講話，問他好不好，沒講什麼，電話卡就沒錢了……。」有了網路之後，她現在每天和家人通話好幾次，我們訪談進行前，Supami 才結束和小女兒的視訊，她說：「她剛放學了，可以講電話，我問她今天在學校好不好。」

10 儘管網路普及，受訪者的經驗反映網路使用的資源差異和不平等。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使用網路「吃到飽」的方案，部分申辦固定流量，於外出時用，平時則透過雇主家的無線網路上網，也有少數的受訪者談到，雇主不開放使用家中的網路。印尼室內電話的普及率很低，手機是較為普遍的通話媒介，但部分受訪者的家人間近幾年才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除了一位受訪者剛在家中申裝無線網路，其餘受訪者的母國家人皆透過固定流量的電話網卡上網，流量耗盡時，再買新的網卡。不少受訪者表示，電話網卡的費用是母國家庭每個月的主要開銷項目之一，費用從她們的薪資匯款支付。

離婚後，Ati 和父母以及兩個孩子住在雅加達的市郊。在臺灣工作已經超過 10 年的她，回想和家人聯絡方式的改變，從航空郵件、國際電話卡到現在的網路視訊。還在手寫信件的年代，Ati 每個月都會寫信，抒發對家人的思念。她說：「我想他們的時候，就一直寫一直寫，寫在紙上……。我不知道媽媽會不會回信，收到信時很開心，不過，要兩三個月。」Ati 和其他受訪的家庭看護移工雖然期待收到回信，但多抱著不確定的希望，特別是受限於教育程度，他們的父母不見得能順暢地使用文字溝通。另外，一來一往的航空郵件，難以即時回應她們對家人的想念或是情感需求，更加凸顯跨國遷移造成的空間與時間距離。Ati 也談到當國際電話卡出現後，取代航空郵件成為她和家人間主要的聯繫方式，但昂貴的費用限制了通話頻率和時間：「那時候，不是想打電話就打，很貴啊，我在打折、便宜的時候才會打電話，一張電話卡也沒辦法講很久，大概兩次（通話）就沒錢了。」智慧型手機和網路的普及，重組跨國遷移產生的空間感和時間性，提供 Ati 和母國家人更具備可近性、價格可負擔的情感連結媒介，特別是她的雇主提供免費使用的無線網路。她說：「我現在每天晚上都會跟兒子視訊，跟他還有我爸爸媽媽說話。」

藉由 ICTs，與孩子以及他們的照顧代理人聯繫、聊天，是多數受訪者日常的例行活動。不過，臺灣時間快印尼一小時，為減少時差造成的影響，受訪者描述她們如何跨國／時持續地活在不同的時區，Supami 這麼說：「我想（跟他們）video call 的時候，會先看一下（時間），女兒放學了嗎？在家嗎？他們現在在做什麼？有些時候我有時間，他們沒空。」視訊或通話需要利用母國家人空間的時間，無法配合時，她們會改以文字訊息，這也用於即時的日常問候，特別是和孩子之間。例如：她們會依照孩子的作息發送短信：「早餐吃了嗎？吃什麼？」、「今天上學要加油！」、「放學了嗎？」、「回到家了嗎？」、「今天有做什麼嗎？」

這些移工媽媽藉由 ICTs 媒介，跨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表達關心，並維持身體缺場下的家庭和母職實作。如同 Lina 說的：「我要在臺灣賺錢，沒辦法在家陪她（小孩），只能常常 teks 她，要她讀書加油、要乖、聽阿公和阿嬤的話……。」此外，家庭看護移工通常須與受照顧者和雇主同住，她們解釋，因照顧工作的勞力和情緒密集、高度變動性、24 小時待命或是雇主對手機使用的限制，一方面，她們得尋找工作的縫隙與家人視訊或通話；另一方面，她們需與母國家人協調，包括有空的時間、可視訊的設備和穩定的網路。

Anita 回想小時候，母親在阿拉伯工作，只能久久講一次電話，難以緩解思念的心情：

小時候，我和媽媽好幾個月才能講電話，我們會到村子裡有電話的那個人家裡，我是最小的孩子，會撒嬌、說很想她、問她什麼時候要回來，雖然有講電話，還是很想很想她。

Anita 剛到臺灣的時候，還沒有手機，無法跟家人聯絡，後來在其他看護工朋友協助下，申辦了手機。女兒跟 Anita 的媽媽、姊姊一家以及哥哥（哥哥還沒有小孩，太太在新加坡工作）同住，她們每天通話，不過那時 Anita 媽媽還沒有智慧型手機，只能語音，先生在的時候，透過他的手機才能視訊。我們訪談的前一年，Anita 在臺灣買了智慧型手機，請託同村的朋友帶回給女兒，女兒有了自己的手機後，她們天天視訊聊天：

白天我要工作，沒時間講電話，阿嬤（Anita 照顧的老人家）很早就睡覺，她睡著後，我會跟女兒還有媽媽視訊，但不能開燈，他們看到我暗暗的。我跟女兒說，暗暗的不用視訊，她說我可以看到她就好。

和航空郵件、國際電話相較，ICTs 的普及提供看護移工更為平價、便利、即時的與母國家人聯繫的媒介，不過暫時性遷移體制下同住的聘僱安排、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照顧工作的特殊性等交互作用，形塑科技使用的不平等。

ICTs 的使用，是參與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與家人聯絡、維持情感的重要媒介，和家人視訊、通話，在科技的協助下，成為她們生活例行的家庭任務。從東爪哇來臺灣工作四年的 Andreia 有三個小孩，她講到：「每天，一定要講電話，我每天都想看他們（孩子）。」不過，大多數的受訪者指出，她們與家人的談話經常環繞在日常作息和資訊交換，例如：「問他們今天好不好？過得怎麼樣？」、「中午吃了什麼？晚餐吃什麼？」儘管較少複雜情感或是想法的交流，透過每日的視訊通話，受訪的家庭看護移工得以參與母國孩子的日常韻律，藉由網路空間創造跨國／時共享的節奏。

在跨國／時脈絡下，這些移工媽媽能與母國家人聯繫、參與孩子的日常，不僅是因為科技物的媒介，更仰賴她們積極地跨國／時管理工作和家庭的作息，協商有酬與無酬的照顧工作，以克服臺灣與印尼間的空間距離和時間的不同步。然而，以 ICTs 媒介的跨國連結，是否能完全取代以身體親密性為基礎的情感關係？其創造的共存感是真實或虛擬？第七節會討論當中存在的心理矛盾。

2. 資訊和通信技術媒介的照顧協作

因為跨國／時的距離限制，移工媽媽無法陪伴在子女的身邊，提供直接照顧，她們不僅以 ICTs 做為媒介，與孩子進行日常互動、維繫關係，同時藉由科技物和孩子的照顧代理人進行跨國照顧協作。Lily 離開東爪哇鄉下的家，在臺灣工作近 10 年的

時間，12 歲的女兒由她的父母照顧。扣掉每個月在臺灣生活的費用，Lily 將剩餘的薪水全數匯款給媽媽代為分配，包括：父母和女兒的日常開支、整修房屋的費用以及固定的儲蓄。Lily 說，女兒想買什麼東西或是需要較大筆的支出時，她會透過視訊或是電話交代媽媽，像是女兒一直希望能和 Lily 視訊，但 Lily 爸爸沒有智慧型手機，得等到她姊姊回父母家時。我們訪談的前一年，Lily 請爸爸用她匯回的薪水，替女兒買了新手機，之後，她們天天視訊。家鄉在中爪哇的 Miya，她的母親在薪水匯款運用上，扮演和 Lily 的媽媽類似的角色，除跟她強調定期儲蓄的重要，當女兒需要較大筆的花費時，Miya 的媽媽一定會先告知她、徵詢同意。

對 Lily、Miya 和部分受訪的家庭看護移工而言，ICTs 做為媒介的日常溝通，不僅具有維繫情感的意義，亦有助於跨國／時照顧的協作，她們可以和孩子的照顧代理人確認薪水匯款的運用、滿足孩子物質的需要或慾望，以及討論孩子的照顧和教育安排。受訪移工中，有五位的孩子在訪談時或在稍後就讀穆斯林宗教寄宿學校，她們關心孩子學業表現或是身心穩定，藉由頻繁的通話和視訊，與家人（包括先生和父母）溝通孩子的教育決定和安排，像是 Dari 和 Elly 說服不同立場的家人，在她們的堅持下，女兒最後沒有就讀鄰近的公立學校，而是就讀學費要價不貲、管理嚴格的寄宿學校。

少部分的受訪者分享她們的照顧代理人無法盡責管教孩子，甚至疏遠她們和孩子間原本就不親密的情感關係。Yanti 來自印尼的蘇門答臘，兒子三歲半時，她到新加坡工作，四年後返家，原本不想再出國工作的她，因為蓋房子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在家短暫停留一年後，2013 年她開始在臺灣擔任家庭看護移工。Yanti 的兒子國中畢業後，就沒有繼續升學，每天不是在家裡打手機遊戲就是在住家附近閒晃，有時協助阿公和阿嬤種田，她無

奈地說：「我爸媽對他太好、管不動他，也沒有辦法勸他繼續讀書，就隨他做想做的事情……。」儘管 Yanti 人在臺灣，仍覺得要為孩子的教育或是管教負責，她常跟父母溝通兒子上學的重要，有一陣子和孩子的關係因此劍拔弩張，她說：「每次只要一講電話，我和他都會生氣，我叫他去上學，他就是不肯。」

訪談時，Any 已經在臺灣工作八年，兩個兒子由先生照顧，孩子還小的時候，她媽媽也不時會提供協助。不過，媽媽和先生的關係不好，孩子大一點之後，先生就很少帶他們回 Any 的媽媽家，她生氣地說：「我媽媽年紀大了，她想看孫子，我老公說他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很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一個月，通通沒有（帶孩子回 Any 媽媽家）……。」。因為婆媳衝突和宗教信仰的差異，Any 與先生的情感在婚後漸趨冷淡，不過，考量孩子和離婚不易，他們勉強維持法律上的婚姻關係。除了自己的生活開支和給媽媽的費用，Any 把所有的薪水都交給先生安排運用，她抱怨：「他不讓我存錢，要我把錢全都給他，錢給他管沒關係，但要記下來花在哪裡，他都沒記，錢常常這樣就沒了。」大兒子知道 Any 和先生的感情不好，把原因歸咎為她堅持到臺灣工作，先生從來不跟孩子解釋或是為他們緊張的關係緩頰，Any 始終難以修補和大兒子間的情感裂縫。

這些移工媽媽能否藉由 ICTs 與孩子維持日常的溝通、聯繫情感關係和實踐跨國母職，除了她們自身的參與和付出的時間、心力，照顧代理人的態度以及與她們之間的協作關係，扮演關鍵的因素。

七、跨國母職的矛盾感：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和情感不對稱

接近半數的研究參與對象在臺灣工作的時間超過 10 年，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有過其他國家的工作經驗。第一次出國工作時，她們大多認為自己是「暫時」、「短暫」的離家，她們看待自己是特例，不同於那些長時間居住在外國、和家人分離的印尼女性移工。訪談時，大多的受訪者難以線性的時間，具體量化目前或未來計畫繼續在臺灣工作的年數，她們評估的時間量詞往往以任務為單位，並環繞在母國家人和孩子的需求，例如：蓋一棟自己的房子、三餐溫飽、有能力購買想要的物品以及孩子上學需要的費用等等。

在臺灣工作十多年的 Dari 和 Ati，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試辦沒多久後，在雇主與仲介的協助下，申請到臺灣的永久居留。當年，在她們離開還在襁褓的孩子時，盤算著（三年）契約到期後，就可以和家人團聚，沒想到，接連更新契約一再延長她們在臺灣的工作年限。Ati 對照自己第一次出國到新加坡工作的經驗：

還沒小孩的時候，有個阿姨介紹我到新加坡工作，在老闆家裡幫忙顧小孩、打掃，那時，我做了兩年多。到臺灣工作的時候，我想很快就可以賺到錢（回家），在家裡做生意賣吃的、照顧小孩和我的爸爸媽媽。

一直到現在，Ati 都還沒有實現賺錢開店的計畫，她告訴我，她的店一定會賣珍珠奶茶。她談到必須留在臺灣工作的原因，像是：伴隨著小孩成長需要的教育費用，包括支持喜歡讀書的女兒就讀學費昂貴的住宿學校，或是她為自己和家人的未來買的房

子，每月得繳交的貸款，以及年老的父親這幾年進出醫院的花費。

Miya 的家鄉在印尼的中爪哇，我們認識時，她在臺灣工作快滿七年，來臺灣之前，她在阿拉伯擔任家庭幫傭。相較於其他受訪移工，Miya 的經濟狀況相對穩定，先生魚塢養殖的收入雖然不穩定，但可以支應自身的開銷。她的薪水負擔女兒的生活費用以及原生家庭父母部分的經濟需要，幾年下來，她已經蓋了房子，每個月扣掉必要花費後，還有一定的存款。儘管如此，Miya 的未來充滿不確定和未知，她說，女兒還要讀書，之後會需要更多的錢，什麼時候要（或可以）結束在臺灣的工作，她沒有答案。金錢支出、物質慾望、孩子的教育、生活裡的不確定性和各種風險，持續延長 Ati、Miya 和其他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在臺灣工作的時間，造成她們對未來難以有具體的規劃，並被困於永久暫時性（permanent temporariness）（Bailey et al. 2002）的弔詭。

Ati、Dari 以及其他受訪者，描述 ICTs 的發明和普及如何重組在跨國勞動力遷移脈絡下，她們的物理空間感與時間性，包括過程中所經驗的系列矛盾感：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因為經濟的考量，2016 年，臺灣政府取消移工工作滿三年至少需要離境一日的規定後，Dari 就沒有返鄉探望過家人，以 ICTs 為媒介的跨國／時的空間，取代以身體親近性為連結的實體相見。她回想智慧型手機和網路還不普遍的時期，只能打電話、聽聲音的不確定感：「只有講電話、聽聲音，看不到人，就是不一樣，不知道她（女兒）有沒有長高、變胖、有沒有生病，很多擔心。每次講完電話後，還是會很想她，沒有用……。」Dari 談到視訊的差異：「看到人很開心，不一樣，感覺（我們）很近。」比較隔著螢幕視訊和實體相聚時，她又感嘆道：「當然不一樣，視訊比較近，還是跟真的在一起不一樣，抱不到、摸不到。」除了缺乏身體的接觸外，部分受訪者進一步解釋「在一起」又「不

在一起」的矛盾感受，像是 Yenny 提到，儘管每次視訊看到孩子是開心的，但彼此之間互動的生疏，又讓她明白孩子無法瞭解她到海外工作的動機，更別說一起參與她想像的家庭未來。參與研究的移工媽媽們多半很難具體闡述 ICTs 的使用造成的改變，這也反映 ICTs 所媒介之互動與情感的虛實，此外，她們的經驗呈現此過程中科技物可能帶來的心理矛盾，包括對空間和時間的感知。

Wati 在臺灣工作的最後幾年，女兒從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工作，她回想女兒大學在外租房子，兩個人都有空時，會開著視訊，掛在通訊軟體上一整天。Wati 和她照顧的長者獨居，手機的使用或是和家人的通話，較少受到雇主的限制，她說：「我們會開著視訊，把手機放在旁邊，我做我的事情，她做她的，不會一直講話，想講話的時候講話，好像在一起、沒有分開。」Wati 和女兒的隔海視訊，體現 ICTs 中介的共存感（co-presence），似乎能將時間與空間凍結在特定的當下，消除物理性的距離，並感到親密。但 Sudi 的經驗則呈現科技創造的虛擬真實，難以取代以身體為媒介的親密性，雖然她也強調，比起只能聽聲音，透過視訊看到小孩的臉，讓她覺得很開心，她分享視訊結束後的落寞：

有時候，跟孩子視訊完，我會覺得很難過，我發現自己還是在臺灣，不在印尼。有時候，很累的時候，我坐在那裡發呆，想著，我（現在）在印尼的家裡，我很想回家，一直想靠近家人。

ICTs 創造的暫時共存感，並未延續存在於 Sudi 結束和家人視訊後的日常，反而提醒她自己所處的特定時空和家人之間的斷裂。

這些移工母親使用 ICTs 進行跨國照顧的經驗，指出科技與照顧實作的複雜和動態。ICTs 的普及和以其為媒介的日常互動，並不一定能消除孩子因母親長期不在家產生的疏離感以及取代身體

創造的親密性。受訪的印尼看護移工談到技術的便利，以及她們從中的情感獲益，不過，孩子的經驗不是總和她們一致。Any 大兒子的成績很好，她引以為傲，不過，他一直不能理解媽媽出國工作的選擇，兩人的關係時常很緊張。訪談時，Any 對大兒子略有微詞：

他現在（因為疫情）在家網路上課，我每天都打電話給他，有時候沒接，有時候接起來生氣的說忙著寫功課，就掛掉了。我傳訊息給他也是一樣。後來，我生氣的跟我老公抱怨，我賺錢通通給小孩，結果他不理我是怎樣，如果在忙可以跟我說，不是不回答。

面對孩子時，Any 通常不會表現這些負面的情緒，只能對著先生抒發，儘管到臺灣工作是為母國的家庭賺錢，她心裡還是抱著不能陪伴孩子身邊的愧疚。

受訪的移工媽媽，超過半數使用 ICTs 與孩子聯繫的經驗和 Any 很類似，孩子經常不接電話，短信多是「已讀不回」的狀態。Wasiri 離家時，大女兒五年級，小女兒才幾個月大，和姊姊不同，就讀國小二年級的她，沒有任何和媽媽一起生活的記憶或是連結。說起和小女兒的日常互動，Wasiri 感到挫折：

我打電話給她，經常沒有接。她需要錢或是想買東西時，才會願意跟我講電話。她說，我不是她媽媽，阿嬤（Wasiri 的媽媽）才是她媽媽。我聽到她這樣講，覺得很難過，她怎麼這麼說，但也沒有辦法……。

來臺灣七年，Wasiri 只短暫回去過印尼一次，相較於大女兒和媽媽見面的開心，小女兒很抗拒和她單獨在一起。面對小女兒的生疏，她無能為力。

訪談時，Yanti 的兒子已經國中畢業，他們一起生活的時間不到五年。Yanti 不在家的時候，兒子由她父母照顧，她感嘆地說：「他和我爸媽感情很好，和我不好，連叫我媽媽都不願意。」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因為網路視訊普遍後改善，講到兒子時，Yanti 語氣多半是無奈的：

他國中畢業就不讀書了，我以前是想讀沒有錢，我一直勸他，都沒有用。（那他現在在做什麼？）在家裡幫我爸爸、媽媽種田，還有花錢，花我賺的錢。平常他都不會跟我講話，每次講話就是要錢。

Yanti 的爸爸和兒子都有手機，也可以視訊，她是少數沒有天天和家人視訊通話的受訪者，她說，一方面家裡沒有無線網路，網路卡很花錢；另一方面，兒子不是很願意視訊講話，每次通話最常提到的就是沒錢。

既有的研究（Wilding 2006）指出，ICTs 的發明和普及，對於跨國家庭關係的維持與情感的交換扮演關鍵的媒介，但是，移民、移工如何發展與實踐 ICTs 媒介的照顧與情感關係，經驗十分不同。本研究訪談的移工母親，她們的經驗呈現 ICTs 使用產生的矛盾感。部分人指出運用 ICTs 讓她們跨國／時感受和孩子「在一起」，共享親密關係，或是逐漸改善原本疏離的情感。另一部分人的經驗則顯示，ICTs 做為新的溝通媒介的限制，以及其無法取代以身體親密性為基礎的照顧和關係，她們認為 ICTs 有助於和母國孩子間的聯繫與母職實踐，不過，她們的孩子無法給予同等的情感回饋，甚至認為是對日常生活的干擾。

八、結論

本研究闡述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母職實踐鑲嵌於勞動力接受國的暫時性遷移體制，受到客工制度、物質條件以及身體不在場的限制，她們必須協商印尼傳統性別文化所定義的「理想母親」，並賦予海外工作母職照顧的意涵。為因應跨國勞動力遷移所造成的物理空間與時間性的重組，這群印尼女性移工藉由匯款、贈送禮物、安排照顧代理人以及運用資訊與通信技術等策略，呈現她們如何動員資源進行跨國／時的照顧實作與協作，並透過 ICTs 媒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和維繫關係。她們的經驗指出，結構條件如何形塑和限制她們做為母親的能動性，以及她們在過程中所經驗的心理矛盾和親密關係的不對稱。

傳統的解釋模型對遷移動機的理解，並不適用於參與本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她們並未完全體現如古典經濟學派所主張的計算成本、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性人（Todaro 1976）。這群移工母親看似以經濟因素解釋海外工作的決定與安排，實則蘊含母親的責任與家庭照顧的實踐，她們的日常實作擴大母職照顧的內涵，納入物質的面向，提供我們進一步反思愛／物質並非對立的概念。同時，她們的經驗指出照顧／養家二分家庭角色不僅是動態的，亦難以完全互斥。

短暫的遷移體制剝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以身體親密性為基礎的母職實作之可能，ICTs 的發展和普及，成為她們跨國／時實踐母職的重要媒介（Peng and Wong 2013; Chib et al. 2014）。本研究描繪這群移工母親如何運用 ICTs，發展母職實作的多元策略，以協商身體不在場的限制，並呈現照顧協作過程中，她們的參與和付出的勞力、心力和情感工作。基於研究發現，我強調我們不應以「犧牲的愛」浪漫化移工母親的海外工作，或是樂觀的認為

ICTs 媒介的照顧可以完全取代身體親近性，同時須關注空間與時間的重組，以及 ICTs 所造成的心理矛盾感——愛／物質、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並反思二分的分析框架難以理解跨國母職實作的動態和複雜。

參與本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數對未來難以有具體的計畫和想像，部分的人雖然買了土地、蓋了房子，仍擔心著每月固定的家庭支出，以及孩子成長日漸龐大的教育費用，非預期的天災（例如：淹水、眷養的牲畜生病）或是意外（例如：家人或孩子生病）往往加劇原本就處於危脆狀態的經濟壓力。借貸遷移（debt-financed migration）看似創造跨國境流動的機會，讓這群受限於鄉村地理空間、沒有資本移動的鄉村女人，擁有海外工作的選擇（Platt et al. 2017）。不過，社會學者提出序列性的勞動遷移（serial labor migration）（Parreñas et al. 2019）的概念，指出大多數的女性家庭移工先後經歷數個勞動力接待國的遷移路徑，卻始終無法掙脫離散的迴圈，以及實現經濟階級向上流動的願景，甚至，受困於永久暫時性的不確定狀態。永久／暫時的弔詭凸顯遷移脈絡下非線性的時間以及其對跨國母職帶來的影響和挑戰。

為回應研究目的，本文聚焦於呈現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母職和遷移的互為鑲嵌。不過，母職不應被視為女人的天性或是本能，並非育有子女的女性移工都有做為母親的認同，或是看待其為優先的身分和責任。酷兒（queer）觀點不僅揭露既有遷移研究的異性戀中心（Manalansan IV 2006），也提供未來研究的方向：呈現女性移工母職經驗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反思母親—孩子情感關係的理所當然化，以及納入不同性／別認同之移工。

作者簡介

梁莉芳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做為女性主義社會學者，長期以來的研究興趣環繞於高度性別化的「隱形工作」，聚焦於有酬和無酬的照顧與照顧工作，包括母職。近幾年與目前執行的研究關注跨國勞動遷移脈絡下，藉由資訊和通信科技媒介的家庭、照顧與母職實作，過程中涉入的認知勞動和情緒勞動，以及其造成的性別不平等。本文為部分的研究成果，希望能藉此倡議移工做母親的權利。

參考書目

- 李有容、鄭杏茹，2018，〈命運或機會：我國外籍家庭看護工轉換雇主實證分析〉。《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9: 123-167。
- 曾熾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32: 1-58。
- Acedera, Kristel Anne and Brenda SA Yeoh, 2019, "Making time': long-distance marriages and the temporalities of the transnational family." *Current Sociology* 67(2): 250-272.
- Anderson, Bridget, 2015,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good workers, poor slaves, new connections."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2(4): 636-652.
- Asis, Maruja MB, 2002, "From the life stories of Filipino women: personal and family agendas in migrat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1): 67-94.
- Bailey, Adrian J., Richard A. Wright, Alison Mountz and Ines M. Miyares, 2002, "(Re) producing Salvadoran transnational geograph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 (1): 125-144.
- Baldassar, Loretta, 2016, "Mobiliti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ransforming care in family life." Pp. 19-42 in *Family life in an age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global perspectives through the life course*, edited by Majella Kilkey and Ewa Palenga-Möllnbec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Bélanger, Danièle and Rachel Silvey, 2020, "An Im/mobility turn: power geometries of care and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6(16): 3423-3440.
- Boccagni, Paolo, 2012, "Practising motherhood at a distance: retention and loss in Ecuadori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2): 261-277.
- Boersma, Maren, 2019,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between permanence and temporariness in everyday life." *Current Sociology* 67(2): 273-293.

- Carling, Jørgen, Cecilia Menjivar and Leah Schmalzbauer, 2012, "Central themes in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parenthood."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2): 191-217.
- Chan, Carol, 2017, "Not always 'left-behind': Indonesian adolescent women negotiat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filial piety and care."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8(3): 246-263.
- Cheng, Shu-Ju Ada, 1996, "Migrant wome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1): 139-152.
- Chib, Arul, Shelly Malik, Rajiv George Aricat and Siti Zubeidah Kadir, 2014, "Migrant mothering and mobile phones: negotiations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1): 73-93.
- Chilton, Adam S. and Eric A. Posner, 2018, "Why countries sign bilateral labor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7(S1): S45-S88.
- Coe, Cati, 2011, "What is love? the materiality of care in Ghanai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9(6): 7-24.
- Cwerner, Saulo B, 2001, "The time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7(1): 7-36.
- Dauvergne, Catherine and Sarah Marsden, 2014, "The ideology of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post-global era." *Citizenship studies* 18(2): 224-242.
- Dewi, Elisabeth, 2011,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good' mothering and family roles among Indonesia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Journal of the Motherhood Initiative for Research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2(2): 208-225.
- Dreby, Joanna, 2006, "Honor and virtue: mexican parenting in the transnational context." *Gender & Society* 20 (1): 32-59.
- Francisco, Valerie, 2015, "'The internet is magic': technology, intimacy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Critical Sociology* 41(1): 173-190.
- Fresnoza-Flot, Asuncion, 2009, "Migration status and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the case of Filipino migrants in France." *Global networks* 9(2): 252-270.
- Glenn, Evelyn Nakano, Grace Chang and Linda Rennie Forcey, eds., 2016,

- Mothering: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agency*. New York: Routledge.
- Hochschild, A. Rusell, 2001, "Global care chains and emotional surplus value." Pp. 130-146 in *On the edge: 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 edited by W. Hutton and A. Giddens. London: Vintage.
- 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and Ernestine Avila, 1997, "'I'm here, but I'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and Society* 11(5): 548-571.
- Horst, Heather A., 2006, "The blessings and burdens of communication: cell phones in Jamaic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Global Networks* 6(2): 143-159.
- Horton, Sarah, 2008, "Consuming childhood: 'lost' and 'ideal' childhoods as a motivation for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1(4): 925-943.
- Hugo, Graeme, 1995,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some observations from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2-3): 273-301.
- Hugo, Graeme, 2002,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1): 13-46.
- Hugo, Graeme, 2005, "The ne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challenges for population research."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1): 93-120.
- Jaggar, Alison M.,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Katigbak, Evangeline O., 2015, "Moralizing emotional remittances: transnational familyhood and translocal moral economy in the Philippines' 'Little Italy'." *Global Networks* 15(4): 519-535.
- Kilkey, Majella and Laura Merla, 2014, "Situating transnational families' care-giving arrangement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s." *Global Networks* 14(2): 210-229.
- Lan, Pei-Chia, 2003, "Maid or madam?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 society* 17(2): 187-208.
- Lan, Pei-Chia, 2006,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iang, Li-Fang, 2011, "The making of an 'ideal' live-in migrant care worker: recruiting, training, matching and disciplining."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4(11): 1815-1834.
- Liang, Li-Fang, 2014, "Live-in migrant care workers in Taiwan: the debate on the household service act."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3(2): 229-241.
- Liang, Li-Fang, 2018, "Migrant care work in Taiwan: applying a feminist ethics of care to the relationships of 'live-in' c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e and Caring* 2(2): 215-233.
- Lutz, Helma and Ewa Palenga-Möllnbeck, 2012, "Care workers, care drain, and care chains: reflections on care, 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Social Politics* 19(1): 15-37.
- Machali, Rochayah, 2001, "Women and the concept power in Indonesia." Pp. 201-209 in *Love, sex and power: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usan Blackburn. Clayton: Monash Asia Institute.
- Madianou, Mirca, 2012, "Migration and the accentuated ambivalence of motherhood: the role of ICTs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12(3): 277-295.
- Madianou, Mirca, 2016, "Ambient co-presence: transnational family practices in polymedia environments." *Global networks* 16(2): 183-201.
- Madianou, Mirca and Daniel Miller, 2013,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London: Routledge.
- Manalansan, IV and Martin F., 2006, "Queer intersections: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0(1): 224-249.
- Mason, Jennifer, 2004, "Managing kinship over long distan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isit'."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3(4): 421-429.
- McKay, Deirdre, 2007, "'Sending dollars shows feeling'—emotions and economies in Filipino migration." *Mobilities* 2(2): 175-194.
- Meeus, Bruno, 2012, "How to 'catch' floating populations? research and the fixing of migration in space and tim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5(10): 1775-1793.

- Merla, Laura and Loretta Baldassar, 2011, "Transnational caregiving between Australia, Italy and El Salvador: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on the capability to care at a distance." Pp.147-161 in *Gender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edited by E. Addis, P. de Villota, F. Degavre, and J. Eriksen. London: Ashgate.
- Merla, Laura, Majella Kilkey and Loretta Baldassar, 2020,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ransnational care: families confronting borders'." *JFR-Journal of Family Research* 32(3): 393-414.
- Moghadam, Valentine M., 2005, "Women'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hat difference has the neoliberal policy turn made?"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1(1): 110-146.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97, "Wom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 scripts: Ideologies of domination,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solidarity." Pp.3-29 in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 edited by A. Jacqui, and C. T. Mohanty. New York: Routledge.
- Nedelcu, Mihaela, 2012, "Migrants' new transnational habitus: rethinking migration through a cosmopolitan lens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9): 1339-1356.
- Nicholson, Melanie, 2006, "Without their children: rethinking motherhood among transnational migrant women." *Social Text* 24(3): 13-33.
- Oberman, Yael and Ruthellen Josselson, 1996, "Matrix of tensions: a model of mothering."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0: 341-359.
- Oishi, Nana, 2005, *Women in motion: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Wayne, 2016, *Indonesia's overseas labour migration programme, 1969-2010*. Leiden: Brill.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01a, "Mothering from a distance: emotion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Feminist Studies* 27(2): 361-390.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01b,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03, "The care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children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Pp. 39-54 in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edited by B. Ehrenreich and A. R. Hochschild. London: Granta Books.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05a, *Children of global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gendered wo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05b, "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5(4): 317-336.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10,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a source of gender conflicts in the family."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88(5): 1825-1855.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17, "The indenture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45(1/2): 113-127.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Krittiya Kantachote and Rachel Silvey, 2021, "Soft violenc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precari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unfree labour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7(20): 4671-4687.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Rachel Silvey, Maria Cecilia Hwang and Carolyn Areum Choi, 2019, "Serial labor migration: precarity and itinerancy among Filipino and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3(4): 1230-1258.
- Paul, Anju Mary, 2015, "Negotiating migration, performing gender." *Social forces* 94(1): 271-293.
- Peng, Yinni and Odalia MH Wong, 2013, "Diversified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via telecommunication: intensive, collaborative, and passive." *Gender & Society* 27(4): 491-513.
- Pe-Pua, Rogelia, 2003, "Wife, mother and maid: the triple role of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in Spain and Italy." Pp.157-180 in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N. Piper and M. Roces.

-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Piper, Nicola, 2010,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temporary contract migration in Asia revisited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olicy and Society* 29(4): 399-411.
- Piper, Nicola, 2022,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in Asia: the transnationality-precarity nexu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60(4): 38-47.
- Platt, Maria, Grace Baey, Brenda S. A. Yeoh, Choon Yen Khoo, and Theodora Lam, 2017, "Debt, precarity and gender: male and female temporary labour migrant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3(1): 119-136.
- Rigg, Jonathan, 2007, "Moving lives: migration and livelihoods in the Lao PDR."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3(3): 163-178.
- Roberts, Bryan, 1995, "Socially expected durations and the economic adjustment of immigrants." Pp. 42-86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dited by P. Alejandro.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Romero, Mary, 2016, *Maid in the USA*. New York: Routledge.
- Rother, Stefan, 2017, "Indonesi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spaces: agency, gender roles and social class form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3(6): 956-973.
- Ruddick, Sara, 1995,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Boston: Beacon Press.
- Rydzik, Agnieszka and Sundari Anitha, 2020, "Conceptualising the agency of migrant women workers: resilience, reworking and resistance."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4(5): 883-899.
- Salzinger, Leslie, 2004, "From gender as object to gender as verb: rethinking how global restructuring happens." *Critical Sociology* 30(1): 43-62.
- Sassen, Saskia, 1984, "Notes o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ird World women into wage-labor through immigration and off-shore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8(4): 1144-1167.
- Sassen, Saskia, 2013,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Tokyo and London*.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ngh, Supriya, 2006, "Towards a sociology of money and family in the Indian diaspora."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40(3): 375-398.
- Silvey, Rachel, 2004, "Transnational domestication: state power and Indonesian migrant women in Saudi Arabia." *Political Geography* 23(3): 245-264.
- Spaan, Ernst, 1999, *Labour circ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East Java, Indonesia*.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terdisciplinary Demographic Institute.
- Suryakusuma, Julia I., 2004, *Sex, power, and nation: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1979-2003*. Jakarta: Metafor Publishing.
- Tazreiter, Claudia, 2019, "Temporary migrants as an uneasy presence in immigrant societies: reflections on ambivalence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60(1-2): 91-109.
- Thieme, Susan and Simone Wyss, 2005, "Migration patterns and remittance transfer in Nepal: a case study of Sainik Basti in western Nep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3(5): 59-98.
- Todaro, Michael P., 1976, "Urban job expansion, induced migration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a formulation and simplified empirical test for LD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3): 211-225.
- Triandafyllidou, Anna, 2022, "Temporary migration: category of analysis or category of practic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8(16): 3847-3859.
- Tungohan, Ethel, 2013, "Reconceptualizing motherhood, reconceptualizing resistanc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ransnational hyper-maternalism and activism."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5(1): 39-57.
- Tyldum, Guri, 2015, "Motherhood, agency and sacrifice in narratives on female migration for care work." *Sociology* 49(1): 56-71.
- Vives, Luna and Iria Vazquez Silva, 2017, "Senegalese migration to Spain: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practic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3(3): 495-512.
- Wickramasekara, Piyasiri, 2002, *Asian labour migrat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Geneva: ILO.

Wilding, Raelene, 2006, "'Virtual' intimacies? families communicating across transnational contexts." *Global networks* 6(2): 125-142.

Xiang, Biao, 2013, "Multi-scalar ethnography: an approach for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Ethnography* 14(3): 282-299.

Yeoh, Brenda S. A. and Heng Leng Chee, 2015, "Negotiation of (Il)legality in Singapore." Pp. 184-204 in *Migrant encounters: intimate labor, the state, and mobility across Asia*, edited by Friedman S. L. and Mahdavi P.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